

# “江湖吟社”与南宋后期江西诗坛\*<sup>1</sup>

吕肖奂

理宗绍定间的“江湖吟社”，虽不可详考，却提供了“赣寇”与“汀寇”之乱下江西赣吉抚卅各地及闽西北各地诗人纷纷出逃，而隆兴府（豫章）成为逃难诗人聚集地的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可以发现南宋后期江西诗坛十分兴盛的一片“江湖”。这片“江湖”是宝庆江湖诗祸之后“江湖”诗歌最为发达的场域之一。作为江西诗派发源地及主要流行地，南宋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通过戴复古、严羽等浙闽诗人主动入场交流，在吸纳浙闽清轻柔软江湖诗风同时，更为之注入持续强劲刚硬的力量。

【关键词】：江湖吟社；曾原一；戴复古；严羽；豫章东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8）02-0077-11

“曾原一，字子实……绍定庚寅（三年，1230）避乱钟陵，与戴石屏诸贤结江湖吟社。”<sup>①</sup>这个明清方志记录的“江湖吟社”，被后人广泛征引，成为研究戴复古以及江湖诗派的重要资料与证据。然而这段后代相沿的记载，虽然简单清晰报道了中心人物、时间、地点以及结社原因，却既没有曾、戴以外“吟社”之“诸贤”的名录，也没有“吟社”活动的详细资料。此外，曾原一别集不存，所余有限的诗文没有太多“江湖吟社”印记；戴复古《石屏诗集》中写江西各处的诗歌不少，但有关“江湖吟社”的内容基本没有；其他相关文献更是微乎其微。这使得查证或探究这个“吟社”的实况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现存文献看，“江湖吟社”在当时诗坛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在后世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以至于当时没有太多记载，后世也似乎无查证的必要。本文之所以探究，是想了解这个简短“旧闻”产生的语境或者说诗坛原生态，以期洞察到更丰富深远的诗歌“江湖”，对南宋后期诗坛尤其是浙闽以外的江西诗坛有更全面的认识。

这则旧闻中的关键词如曾原一、戴复古、避乱、钟陵、诸贤、江湖吟社，是本文因好奇而探究的入口，其所关联或牵涉的信息，是还原当时诗坛语境与原生态的契机。

## 一、“赣寇”之乱中布衣士人的逃亡选择

诗人建立诗社或吟社，一般而言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语境中，而“江湖吟社”却是一群布衣诗人因“避乱”偶遇而成立的。而且这群诗人所避之“乱”是“寇盗”引发的内乱而非外敌入侵的外乱，这让“江湖吟社”的存在有了一般吟社罕见的历史、社会学意义。

能够证实曾原一绍定“寇乱”期间行迹与心迹的最原始最有力证据，是利登《骹稿》的五六首长篇叙事古诗。利登（生卒年不详）本是“盱江人，家于仙塘，依山结屋，门临清溪，悠然隐者之居”<sup>②</sup>。盱江即建昌军，在江西中东部。而“赣寇”之乱时，利登却在江西东南部赣州之梅川，即宁都，宁都正是曾原一的家乡。据利登《梅川莫令君拉苍山诸诗友，用予“松风”首句为韵，招予游金精，至而盗作，不果游，走佛岩有感》诗题以及诗中所云“此行为山来，至此事已非”来看，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寇乱”：梅川莫县令以及本地与受邀远道而来的诗人们尚在悠游闲适、打算分韵赋诗之际，“盗贼”大作，诗人们张皇失措之后仓皇而逃。曾原一与利登就在这群诗人之中。莫县令邀请利登到梅川与当地诗人唱和，应该是承平时江西各地诗

<sup>1</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11BZW048）

吕肖奂，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5）

人沟通切磋的一种常见方式。实际上，绍定元年（1228）赣民陈三枪（？—1234）等人已经在赣州于都的松梓山起义，而距离于都不远的宁都官民却毫无防范之心，仍在悠游度日。

利登《梅川行》云“我来苍山未一日，平固（注：属石城）弄兵剽宁邑”，描述了自平固、宁邑（即宁都）再到佛岩（均在赣州境内）的“盗乱”状况。尤其是他们躲避于佛岩山寨时，利登生动的诗句加上自注，几乎再现了“寇乱”现场。这场“寇乱”，被载入《江西通志》卷三十所引的《赣州兵寇志》中：“理宗绍定二年（己丑，1229）秋九月，石城张遇龙文胜（即张魔王）反于平固，连破石城、宁、瑞、兴、雩五县。”利登诗歌的个人叙事在细节真实与个体感受上，比史书方志的宏大叙事更能让人身临其境。

不仅如此，利登《走佛岩道中》还谈及其偶遇的六兄弟在紧要关头无法选择逃亡路线，因为“远逝宿无春，近逃寇能至”。而当时的布衣诗人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选择困境。与官员相比，布衣诗人没有镇压或抵抗寇乱的责任，可以站在受害民众的立场批评甚至讽刺各级官员：“州忘县邑县忘乡，我实自弱非贼强。捐金买静恐不受，尸祝鼠辈拖朱黄。”布衣诗人在惧怕盗贼的同时，也能理解一些盗贼横行理由，甚至可以说“何人此日不为盗”这样的话。然而除了“已矣独叹吾生忙，乾坤回首空斜阳”（上引均见利登《梅川行》）外，布衣诗人与普通民众一样六神无主、束手无策。利登《北溪苍山谋避寇，念青阳苍山，徘徊不忍，作古调开之》讲到曾原一在逃亡之际还念及另一布衣曾少裕，因而迟疑不决。但自身难保的诗人，除了迅速出逃也无力拯救他人。利登这一系列纪实古诗以“比较朴素而不专讲工致细巧”<sup>[1] (P263)</sup>的笔触书写出“寇乱”中集体与个人逃亡情状，显示出吁江诗人敏锐朴拙的风格。

曾原一徘徊犹豫之后，随着利登一起逃到赣县附近的崆峒山<sup>⑤</sup>。在崆峒山逗留一段时间后，利登与曾原一分别。利登有诗《予与子实避盗，同走崆峒，予以其年十一月归侍金川<sup>⑥</sup>，踰月，而子实走豫章，阅三载，子实携琬妹归梅川，道经吁，予自金川侍亲归，会之，酒酣，作是诗以饯别，壬辰（绍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诗题叙述了两人避难后期的整个过程，也为“江湖吟社”的曾经存在提供了最有效的依据。曾原一“避盗”远走“豫章”共三年（四个年头），即绍定二、三、四、五年（1229年12月—1232年11月），这三年中，曾原一与他人成立“江湖吟社”自然是可能的。

事实证明，曾原一选择的逃亡目的地是正确的。因为利登躲避金川不久，“寇盗”即攻陷金川，利登有《盗犯金川境，扶侍母妹复走兴安有怀》一诗，描述他们一家在盗贼进逼下的再次逃亡。而豫章显然是安定的，没有再受到“寇盗”侵扰。

既然曾原一绍定二三四五年都在豫章，那么明清方志所云的“避乱钟陵”说法是否有问题呢？《嘉靖赣州府志》以及《江西通志》所云的“钟陵”，是南宋隆兴府所管辖的进贤县之旧称，既属隆兴府，自然可以代指隆兴府。而南宋隆兴府府治所在的南昌县古名豫章县，因而豫章也可以代指隆兴府，所以两者在代指隆兴府的这一点上没有冲突。只是曾原一以及另一位吟社成员戴复古现存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钟陵或进贤，却多次提到南昌或豫章；他们在豫章三年，虽有可能到隆兴府各地包括钟陵游走甚至借住，但其活动中心应该是豫章。因此“避乱钟陵”，显然不如“避乱豫章”更为准确。

赣南寇乱是曾原一逃亡豫章的原因，也是“江湖吟社”得以形成的重要语境。

## 二、曾原一与“寇乱”前后的赣、吉、抚、吁诗坛

曾原一现存作品少，很少被人提及，但他在当时诗坛尤其是江西诗坛却声名显赫。刘堦《隐居通议》卷六《苍山序唐绝句》云：“苍山曾子实原一，宁都人也，有诗名于江湖。”则曾原一是未入江湖诗派却有诗名于江湖的江湖诗人。虞集《故临川隐士娄君太和墓志铭》云：“（墓主之先辈娄建）与章贡曾原一、浚仪赵崇峰、同郡林实夫（号止庵）、段信友（浚），六人者，皆一时之名士。”<sup>[2] (卷四十三)</sup>在这些“一时之名士”中，宁都人曾原一代表了整个赣州。

江西布衣名士诗人，自北宋中后期的江西诗派始就代不乏人，有深厚的创作基础，到南宋中后期更是遍布江西的每个州府

军监乃至县乡，其兴盛程度可以与闽浙地区相提并论。吴澄《苍山曾氏诗评序》云：“宋末江右之能诗者，若章贡、若庐陵、若临川、若盱江、若清江，皆有人焉。”造就江西诗风大盛的这些地方性诗人，“所入、所造虽殊，而各有可取，其学识，则章贡曾子实为诸诗人之冠”<sup>[3]</sup>（卷二十一）。曾原一以其“诗名”与“学识”享誉江西，其足迹与交游也遍布江西。

曾原一在“寇乱”之前就与“章贡、庐陵、临川、盱江、清江”各地诗人有师承以及交游唱和关系。曾原一“尝与从弟原郈同师庐陵杨伯子”<sup>[4]</sup>（卷九十四引《宁都先贤传》），杨伯子即杨万里长子长孺。赣州诗人到吉州拜师学习，这种跨地域间的师生关系表达出的是诗人对江西乡贤的尊崇。杨万里活泼灵动的“诚斋体”经由父子衣钵授受，再通过江西乡谊得以一脉相承，且因二曾与他乡诗人的交游唱和而发扬光大，甚至成为江湖诗风尤其是七绝风味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曾原一虽非江湖游士，但他游走江西各地，与临川、盱江诗人交游联络非常密切。据刘壘《隐居通议》卷九云：“希声，名文雷（生卒不详），自号看云……同时乡里以诗名者，碧涧利履道登、白云赵汉宗崇嶠（1198—1255）俱为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赣之宁都有苍山曾子实原一，抚之临川有东林赵成叔崇峰，亦同时诗盟者也。”黄文雷、利登都是南城人，赵崇嶠是南丰人，都属于建昌军即盱江，三人组成诗社可以称作盱江诗社，曾原一与赵崇峰被称作“同时诗盟者”，分别代表赣州和抚州（临川），是“盱江诗社”的外地诗人。这个由三州诗人组成的诗社，诗人之间往来酬唱频繁，是当时江西诗坛一个缩影。利登、赵崇嶠、黄文雷都被列入江湖诗派<sup>[5]</sup>（P303-310），是江湖诗派中保持江西（江右）风格的诗人。曾原一与赵崇峰虽未入江湖诗派，但从其布衣身份及参与的诗社、唱和圈来推断，也可以算作江湖诗派的外围诗人。诸人作品现存不多，仔细考察，诗风有一些近似性，利登是其代表。

吴澄所云的江右之“章贡、庐陵、临川、盱江、清江”，除“清江”（临江军）外，即韦居安《梅涧诗话》所云“绍定间，江右寇作，抚、盱、吉、赣诸邑，多被焚荡”之“抚、盱、吉、赣”，此四州是当时江西诗歌创作最为繁盛区域，却恰好也是绍定“赣寇”扫荡之地，由此可知，“赣寇”对江西诗坛的影响确实不可估量。

“抚、盱、吉、赣”在承平时期诗歌创作十分繁荣，未及第和及第待选的“士之冗余者”尤多，他们相互往来，联系紧密，是杨万里、周必大等中兴大家之后江西诗坛的生力军，传承着江西诗歌创作的一贯传统。突发性的“寇乱”改变了诗人原有的生活，他们四处奔逃并谋求生路，创作与命运也因此发生转机。

“赣寇”在赣、吉、抚、盱横行六七年，期间有多少诗人奔逃他乡，有多少诗人到豫章避乱，很难一一考证。就有赣、抚诗人加盟的盱江诗社看，在“赣寇”之乱中，除利登到金川、兴国外，黄文雷在“淳祐庚戌（1250）乃以《诗经》擢进士科”之前，也是“下第则游缙绅间”<sup>⑥</sup>的游士，其《南丰道中》四首描述了寇乱之后南丰的残破荒凉，可知他在寇乱后回到故乡。寇乱之中黄文雷避乱到哪里不可考，应该有到豫章的可能性。赵崇嶠嘉定十六年（1222）进士及第，不久任石城令，而石城正是绍定寇盗始发之地，尽管方志云赵在平乱中有功，但石城最早被张魔王攻破，从其后赵改知严州淳安县<sup>⑦</sup>看，其军功也不算太大。赵崇嶠在盱江诗社中最早进士及第且在平定寇乱中转官的诗人，应该没有参加江湖吟社。赵崇峰的五七言歌行《金精歌》与曾原一同题诗<sup>⑧</sup>属于次韵唱和，可知二人一直交往密切，只是赵在绍定年间行迹不可考，比较有可能加入江湖吟社。

此外，祖籍邵武而寓居南城的严粲可能是盱江诗社的成员<sup>⑨</sup>，他与赵崇嶠同年及第，绍定初作为守选待阙者在袁甫的徽州幕中任职，袁甫云“同僚三年，坦叔之助不可缕数”<sup>⑩</sup>。“（三年之后，严粲）一日别余去，求书‘悦心’二字，语余曰：‘吾未为参选计，归而绎故书，求吾心之真悦。请大书，将揭诸所居之室。’余曰：‘是得之矣。’”<sup>[6]</sup>（卷十一《赠严坦叔序》）据此，则绍定三、四年，严粲打算回乡读书研理，但“赣寇”已经占据其家乡建昌军，严粲有可能在豫章逗留避难，直到兵火结束后还家。“严坦叔《兵火后还家》诗云：‘万屋烟消余塔身，还家何处访情亲。旧时巷陌今难认，却问新移来住人。’此等景象，经乱离者方知之。”<sup>⑪</sup>严粲有可能在豫章参加过“江湖吟社”。他也被列入江湖诗派<sup>[5]</sup>（P301），诗风与戴复古相近。

“寇乱”改变了不少诗人正常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一些诗人的命运。譬如与戴复古有唱和的建昌军南丰诗人黄载（字伯厚，号玉泉），因在绍定中参与陈韡（1180—1261）幕府平乱而授武阶<sup>⑫</sup>，证明布衣确实可以依靠在幕府中出谋划策建立军功而

取得官职。汀寇与赣寇先后被陈韡平定，当时避乱到陈韡幕府中的一些布衣诗人因此得到了进身机会。

而避难到豫章的诗人却不像黄载那样幸运。吴澄《苍山曾氏诗评序》云：“子实讳原一，居宁都苍山之下。三贡于乡。又以平寇功免文解，四试礼部不偶，朝臣列荐，授官，官至承奉郎、知南昌县。诗文有集，没六十八年矣。”<sup>⑧</sup>曾原一的“平寇功”，当是《江西通志》所云的“及归，偕其叔父益之倾资产筑城以御寇”。这位布衣诗人在豫章三年，并未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只好在绍定五年底返乡，然后通过倾尽家产以抵御敌寇的方式而得到免解资格。

由此可知，江湖吟社是个纯粹的布衣诗社，避乱的布衣诗人并未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权贵或高级官员，当时隆兴府并无陈韡那样的人物，因而布衣诗人们没能找到更好的出路。“江湖吟社”中应该有一些成员来自“抚、盱、吉、赣”，毕竟豫章是离这些地域不远的安地域。从这个角度上看，赣寇之乱为江西各地布衣诗人提供一次聚合切磋的机会，“江湖吟社”整合展示出绍定年间布衣诗歌创作的规模与力量。

### 三、曾原一与豫章东湖以及宋氏兄弟

曾原一选择“豫章”作为避乱之地，自是因为豫章即隆兴府是江南西路安抚使所在地，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知府袁燮就称“洪都今为大府”<sup>[7]</sup>（卷十《洪都府社舍记》）、“此邦为今都会”<sup>[7]</sup>（卷十《东湖书院记》），相对于“赣寇”肆虐的“抚、盱、吉、赣”，赣北的豫章要相对安定繁荣，因而成为赣南人避乱的首选。但此前豫章的文学却似乎没有“抚、盱、吉、赣”那么繁荣，倒是理学各派比较兴盛。

曾原一祖父曾兴宗因师事朱熹，在庆元党禁时被迫退居家乡，但一直是朱子的忠实信徒，曾原一因而也被朱熹称之为“友”。曾原一能够在豫章寓居三年，可能与创立于嘉定四年（1211）的豫章东湖书院有关。东湖书院主要为讲习儒学而设：“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sup>[7]</sup>（卷十《东湖书院记》）且其堂弟曾原邨曾为东湖书院山长。三年间，曾原一很有可能在东湖书院或其附近安身，而东湖书院极有可能是江湖吟社的活动场所之一。当时的不少书院是未第儒生的习业场所，一些儒生在修习儒学时也吟诗作赋，布衣（江湖）诗人也会以书院为落脚点，因此布衣诗人沾染理学习气现象相当普遍。曾原一与曾原邨兄弟因为家学渊源，都是濡染理学气息较多的诗人，因而深受理学家欣赏。

曾原一现存不多的诗歌中，与豫章有关的诗歌是一首古体歌行《作歌咏苏云卿》：“东湖湖面波渺渺，东湖岸上春土肥。”<sup>[8]</sup>（P38827）讲述的是隐居豫章东湖的苏云卿的故事。据《游宦纪闻》卷三云：“此隆兴士宋自适字正父纪苏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遗址，面揖湖山，平地数十亩，仍筑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为名之曰‘灌园庵’。”苏云卿与张浚的故事由宋自适整理后传播，连上饶二泉之一的赵蕃（1143—1229）都参与其中，最后被记载在《宋史·隐逸传》中，成为南宋比较少见的著名隐逸故事。而宋自适是宋氏五兄弟之兄长。<sup>[1]</sup>宋氏五兄弟本是浙江金华人，其父宋牲（1153—1196）从游于湖湘学派的张栻以及金华学派的吕祖谦，被真德秀称作能够“嗣先哲开来学”的人物<sup>[9]</sup>（卷三十六《跋西园宋茂叔遗稿》）。宋氏五子因庆元二年未葬父于“隆兴府新建县龙子冈”<sup>[9]</sup>（卷四十二《宋文林郎墓志铭》）才迁居到豫章，在庆元党禁的语境中，宋氏兄弟离开靠近京都的金华，就带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意味。他们将金华习俗以及学风直接带到隆兴府，而隆兴府浓厚的理学氛围也接纳了他们。

宋氏五子自适（正甫）、自道（原甫或愿父）、自逢（吉甫，后改名恭，中进士）、自达（德甫）、自逊（谦甫）<sup>⑨</sup>深受其父宋牲影响，与各地理学学派关系密切。尤其是长子宋自适，其诗歌不仅受到盱江包扬（字显道）好评，而且受到闽学真传真德秀的好评：“清隐之诗，南城包显道评之当矣。予尤爱其《赠陆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胆健，后来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阴阳消长风闻际，堂陛尊严山立时’；《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鸥地，莫近平津阁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谦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细微，行逢碍处便须疑。高言怕被虚空笑，阔步先防堕落时。’《和人》云‘三圣传心惟主一，六经载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尝从事于学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识’等句，新奇工致，则人所共喜，不待予评云。”<sup>[9]</sup>（卷三十六《跋宋正甫诗集》）文中列举的这些道学体诗歌，是宋自适儒学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的集中表达。宋父英年早逝，深入儒学的宋自适肩负教诲幼弟们的责任，连诗歌都对其幼弟们谆谆教诲，引起真德秀叹服：“余观正父与愿、谦二弟诗，皆睠焉

有前修风味，所谓亦允蹈之者邪？”<sup>[9]</sup>（卷三十六《跋南轩先生送定叟弟赴广西任诗十三章》）宋自适作为布衣诗人而未入江湖诗派，当是因为其理学超过诗学，应被归入濂洛风雅。其《赠陆伯微》一诗中的“陆伯微”，即抚州金溪陆九渊之子陆持之，是东湖书院首任山长<sup>[7]</sup>（卷十《东湖书院记》），从中可知宋自适与象山心学、东湖书院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理学以及东湖书院，是曾原一与宋自适等人的连接点。

宋氏五兄弟中最著名的是幼子宋自逊。可能因为其父兄都是道学中人，人们对宋自逊的期望也很高，如曹彦约《跋壶山诗集》云：“宋谦甫讲书生远业，发诗人巧思，放达于古体，而韞藉于唐律。是区区词章者，岂将以取重于世哉？昔东莱先生作《丽泽编》，诗中含深意，为儒道立正理，为国是立公论，为贤士大夫立壮志，为山林立逸气，非胸中有是四者，不足与议此。谦甫乃西园贤嗣，西园入丽泽阃奥，源流知所自来，其必有造乎此矣。”<sup>[8]</sup>就期望宋自逊向其祖师吕祖谦以及其父宋甞学习，以诗歌发扬正理公论、壮志逸气。宋自逊实际上也确实曾向这个方向努力，他的四时佳致楼，就从程颢《环翠亭》“暂得登临已忘去，四时佳致属贤公”<sup>[10]</sup>（卷一）得名，可见其受到理学熏染之深。据刘克庄《后村集》卷十六《题宋谦父四时佳致楼》序云：“吟者多矣，率为环翠卒章下注脚，惟张公元德兼取别诗‘佳兴与人同’之句，以互相发明。余不识张公，端平初同召审，张辞不至，余所愧也。故拙诗本张遗意。”<sup>[9]</sup>则当时题咏宋自逊“四时佳致楼”的诗人不在少数，连朱熹弟子张洽（1161—1237）都在其中。宋自逊的“四时佳致楼”，是否是其拜谒权臣而得到巨额馈赠后所买，还有待商榷，但宋自逊购华居一事曾被当作游士干谒权贵的典型事例而引起方回多次抨击。如《瀛奎律髓》卷十三云：“壶山宋自逊，字谦父，本婺女人，父子兄弟皆能诗，而谦父名颇著。贾似道（1213—1275，理宗后期权臣、度宗时期权相）贿以二十万楮，结屋南昌。”<sup>[11]</sup>这种布衣干谒权贵以获利的做法，很不符合理学标准，如果“四时佳致楼”以这种方式建成，张洽等人可能不会题诗吟咏。但宋自逊却因此而坏了自家的后世声名。方回进而批评其诗歌云：“诗篇篇一体，无变态。此诗三四好，五六涉烂套也。他如‘酒熟浑家醉诗成’，逐字评亦佳，但近俗耳。”然而实际上，宋自逊在绍定年间还是豫章诗坛上声名极好的诗人。

宋自逊有《和曾子实题画笈韵》云：“鹭引归船犬吠篱，片时风景万千诗。向来柳下曾沽酒，不似如今看画时。”<sup>[8]</sup>（P38831）虽不能确定是否“江湖吟社”时期所作，但可以肯定曾原一与宋氏兄弟颇有交往唱和之实。宋氏兄弟除了老三宋自逢嘉定中进士走向仕途外，其余四人均均为布衣诗人，当是曾原一等人在豫章时交往唱和的主要对象。

邹登龙（1172—1244）《梅屋吟》有《寄苍山曾子实》云：“东湖从此别，嘉会邈无期。”<sup>[12]</sup>（卷六十九邹登龙《梅屋吟稿》）写的正是他与曾原一曾在“东湖”作别以及作别之后的思念。豫章东湖正是“江湖吟社”活动的重要地域。邹登龙一直隐居于家乡临江军之西郊。其《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云：“诗翁香价满江湖，肯访西郊隐者居。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贾岛少骑驴。但存一路征行稿，安用诸公介绍书。篇易百金宁不售，全编遗我定交初。”可见，戴复古曾专程到其隐居处赠诗集定交。绍定间，临江军也是赣寇横行之地，他很有可能避乱到豫章。邹登龙的《滕阁怀古》证明他到过豫章，他的《岁晚怀愚斋赵叔愚<sup>⑥</sup>、壶山宋谦父》所怀的赵保昌、宋自逊都是与豫章有关的诗人，他很有可能是“江湖吟社”一员。豫章的外地诗人多于本地诗人。

吴澄在谈到“宋末江右之能诗者”时，没有提到隆兴府诗人，可能隆兴府诗人在当时确实不如“抚、盱、吉、赣”那么多或那么出色，而宋氏兄弟作为寓居者，并未被吴澄等江西人算作豫章本地诗人。绍定间，除了宋氏兄弟，“抚、盱、吉、赣”的一些诗人以及戴复古、严羽等闽浙诗人聚集豫章，“江湖吟社”的成立，应该是豫章诗坛最为鼎盛的时期。

#### 四、“汀寇”之乱中的戴复古、严羽以及豫章诗坛

戴复古绍定二年（1229）在闽地，曾到古田、莆田一带，而三年（1230）却到江西豫章与曾原一等人结“江湖吟社”，此后的绍定五年（1232）他复入闽，为邵武府学教授。戴复古是浙江台州人，为何由闽入赣而又复归闽？从其行踪看，戴复古本打算从闽东到闽西北漫游或谋事，但“汀寇”忽作（绍定二年，1229），他便避寇北上到豫章，等“汀寇”被扫平（绍定四年，1231）后，才按原计划回到邵武。

赣、汀相连，曾原一尚未离开赣州时就听闻“汀寇”之事并写诗给利登。利登《次苍山晚出闻汀寇之什》云：“山斋无一事，步到白苹洲。……回首东南路，干戈半白头。”江西布衣诗人对福建时事十分关心了解。福建布衣严羽的《庚寅纪乱》描

摹的正是绍定三年（1030）“汀寇”之乱：“承平盗贼起，丧乱降自天。荼毒恣两道，兵戈浩相缠。此邦祸最酷，贱子忍具言。”严羽嘉定六年到十六年（1213—1223）曾在江西、湖南各地漫游，嘉定十六年返回家乡邵武<sup>[13] (P493)</sup>，不久却遇到“汀寇”起事，而邵武正是“汀寇”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即所谓“此邦祸最酷”。严羽因此也避乱入赣。严羽《将至浔阳，途中寄诸从昆弟》谈及其避难路线，是由赣北入赣，这是因为赣南、闽北交界处的平时通道已经被“赣寇”与“汀寇”占据。严羽《避乱途中》云：“回首兵戈地，遗黎见几人。他乡空白发，故国又青春。多难堪长客，偷生愧此身。本无匡济略，叹息漫伤神。”在战乱之中，严羽也像利登等人一样慨叹自己没有匡扶济世的才能，表达出布衣诗人沉痛身份话语。严羽《沧浪集》卷二有多首与豫章有关的诗歌，如《将往豫章，留别张少尹父子》以及《豫章城》《登豫章城》《孺子台吟》《登滕王阁》《豫章留别诸公》《忆南昌旧游》等诗歌，或作于南昌或忆及南昌，但诗中均未谈及避乱事，且诗作的景致和情绪更符合嘉定漫游情境，因此很难断定其避乱时是否到了豫章<sup>⑦</sup>。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戴复古与严羽走同一路线逃避“汀寇”之乱，但二人在江西漫游时期就过从甚密，有不少共识的人与事，加上二人都到江西避乱，相遇结社也有一点可能性。“汀寇”之乱时，汀州、邵武、延平首当其冲，后来发展到闽东泉州、兴化军，不少诗人也因此出逃，但他们是否像严羽那样到赣北避乱，很难得知。戴复古、严羽等人寇乱之前到江西多年漫游，可能是为了谋生或寻求科第出仕机会，而寇乱之中又到赣北避乱，可能一是因为在那里有熟悉的人事，二是打算进入某个幕府以便建功立业。外在的原因则当与刚发生过江湖诗祸有关。闽赣相连，严羽经常到江西是因为地理交通上的方便，而闽赣交界动乱时，严羽应该选择更安全方便的地方；戴复古作为浙东人，选择到京都临安一带游谒当然更方便且有更多机会，况且在闽赣地区均不安全的情况下，更应该选择江浙地区，但他们却都选择赣北。很有可能是因为临安刚发生过江湖诗祸，政治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宝庆三年（1227）江湖诗祸后，“于是江湖以诗为谤者两年”<sup>[14] (卷十六《诗道奇谈》)</sup>，江湖诗集的刻印骤然停顿，因此绍定初的临安及其附近，无法向布衣诗人提供更有保障的谋生与活动场所。

江湖诗祸的影响，戴复古等人就是在偏离政治中心的豫章也能够感受到。戴复古《伏龙山民宋正甫湖山清隐，乃唐诗人陈陶故圃，曾景建作记，俾仆赋诗》是为宋自适在豫章西山（伏龙山为西山八景之一）的“湖山清隐”而作，因为提及江湖诗祸的重要罹难者之一曾极，则此诗定作于宝庆三年之前。据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十一《跋宋自达梅谷序》云：“按宝庆丁亥，景建以诗祸谪春陵，不以其身南行万里为戚，方且惓惓然忧宋君营栖之无力，尤可悲也。”曾极生长于临川的文化世家，罹难被贬斥之时，还对从他乡迁居豫章多年的宋氏兄弟念念不忘，颇有儒家仁爱的仁人胸怀或者行侠仗义的侠士风骨。他的亲身经历对与他有着深交的戴复古、宋自适兄弟而言，无疑有着切肤之痛，他不久贬死道州，更让戴复古与宋氏兄弟体验到言论足以致命的震慑警示效果。刘克庄也是江湖诗祸罹难者，与曾极患难与共，对曾极关怀的宋氏兄弟更是青眼有加：“余厚宋之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览卷慨然。”两位诗祸亲历者与豫章宋氏兄弟的关系，让“江湖吟社”的“江湖”二字有着劫后余生的特殊存在感，并成为避乱中江湖诗人们遇合时的集体精神寄托。

戴复古交游创作及唱和对象遍布江西各地，其中写到豫章的尤多，但现存与豫章相关的诗歌中，却没有提及曾原一和“江湖吟社”。他的豫章诗词中，反复思念追忆的主要是宋氏兄弟、黄氏兄弟。譬如戴复古离开南昌三年后有《因风再寄南昌故人兼简王帅子文》“寄声黄与宋，书去望书还”“江湖归亦好，朋友恨相疏；倏作三年别，才通一纸书”<sup>⑧</sup>之语。其词《鹊桥仙·周子俊过南昌，问讯宋吉甫、黄存之昆仲》还托人问候宋黄两家：“宋家兄弟，黄家兄弟，一一烦君传语。”<sup>⑨</sup>

早期江湖诗人高翥也曾到过豫章东湖，且与戴复古所说的宋氏、黄氏兄弟有交游唱和，高翥《菊涧集》有《清明日约宋正甫、黄行之兄弟为东湖之集》<sup>⑩</sup>可证。高翥是余姚人，晚年寓居西湖，在淳祐元年过世，不知绍定间是否再到过豫章。可以证明的是，绍定之前的豫章东湖就是各地游士一个集散地，戴复古、高翥、曾极、严羽等人都在这里漫游生活过。

除了宋自适外，戴复古有《东湖看花呈宋原父》<sup>⑪</sup>，宋原父即宋自道。宋氏、黄氏兄弟中与戴复古关系最密切的是宋自适与黄存之，戴复古《豫章东湖宋谦甫、黄存之酌别》《寄南昌故人黄存之、宋谦甫二首》都提到二人。宋自适《赠戴石屏》云：“又是六年别，浑无一字书。性宽难得老，交久只如初。”也证实两人虽不常见面却情谊深厚。

戴复古追忆的黄存之，也是当时交游颇广的布衣诗人，裘万顷《竹斋诗集》卷三有《次黄存之韵》以及《松斋秋咏次黄存之韵七首》，黄文雷有《次黄存之东皋韵》四首五律，赵汝绩有《题黄存之春庄雨急图》。黄氏兄弟及其家族也是豫章交游的中心人物。戴复古《到南昌呈宋原父伯仲、黄子鲁诸丈》提到“黄子鲁”，可能与裘万顷<sup>②</sup>《竹斋诗集》卷二《用黄子益韵二首》所说的“黄子益”属于同辈，是戴复古的前辈。

戴复古最后一次重访江西大约在端平、嘉熙（1236—1237）年间<sup>③</sup>，到豫章后再次寓居东湖，有《隆兴度夏借东湖驿安下》。其《豫章东湖避暑》“十年如昨日，万象又秋容”所云的“十年”，与其《访苍山曾子实》云“十年重会面”，很可能是同一个“十年”。《豫章东湖感旧》云：“忆见堤边种柳初，重来高树满东湖。交游大半入鬼录，歌醉一时逢酒徒。”提及此次重游故地，当年的“交游”也可能有“江湖吟社”的社员，大半过世，而戴复古当时已经年届古稀。宋自逊《沁园春·送戴石屏》“既有诗千首，如斯者少；行年七十，从古来稀”可以证实。

戴复古《豫章东湖宋谦甫、黄存之酌别》是其此次离开南昌时所作：“湖边长访昔年游，生怕清波照白头。杨柳萧疏多困雨，芰荷憔悴早惊秋。无功及物谈何益，有酒开怀醉即休。江上买舟犹未定，明朝尚可为君留。”这次对“昔年游”的“长访”，从暑热到秋凉，因为有后会无期的预感，告别时才会依依不舍。《既别诸故旧，独黄希声（文雷）往曲江稟议未回，不及语离》云：“别尽诸君不见君，客愁多似海南云。一声何处离群雁，那向江村静处闻。”“老年怀抱晚秋天，欲去思君重黯然。闻道归来有消息，江头错认几人船。”当也写于此次辞别江西。

宋氏兄弟、黄氏兄弟应该是“江湖吟社”的本地成员。尤其是宋氏兄弟，他们由金华移居豫章，不仅需要尽快融入当地文化，还一直与原居住地以及其他地方诗人保持联系，因而成为江浙赣诗人的一个联络中心。戴复古游踪遍布江浙闽赣，他在游走中将南宋东部各地的江湖诗人联结到一起，是江湖诗派中布衣诗人典型，他在江西漫游多年，经常“携刺投诗社”，见证并参与了江西诗歌的发展。

## 五、结语

通过对“江湖吟社”探究，可以还原出理宗宝庆诗祸后、绍定“寇乱”前后江西诗坛布衣诗人活动以及创作的原生态，了解到江浙闽以外的“江湖”，深入体验江西诗派重镇在南宋后期“一统江湖”时代的诗风变化。

江湖诗歌在南宋前期高、孝、光、宁朝兴起并逐渐形成规模，理宗初因继位废立政治问题而引起的宝庆诗祸沉重打击了江湖诗歌的发展势头，并使江湖诗人分散或回归各地；而绍定时期的区域性寇乱却使闽赣江浙一些布衣诗人聚集到赣北，他们组成“江湖吟社”，使其在特殊的时空中具有自觉宣示其江湖身份以及话语权意义：尽管江湖诗人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因诗祸打击而彻底消亡，他们还在别处存在与活动。

江南西路的诗歌创作在北宋时期就十分兴盛，当时不仅士大夫诗人名家辈出，后期更有不少布衣诗人在南昌、南康、临川各地结社唱和<sup>[15]</sup>，创作活动频繁，是江西诗派的主力军。到了南宋前期，本土诗人继续创作，江西诗派余烈犹在，加上江西不少地域是南渡北方士人的寓居地，南北诗风碰撞糅合，形成新的活法诗风。吉水杨万里（1127—1206）、庐陵周必大（1126—1204）等乡贤成为江西诗坛新的楷模，他们引领了“抚、盱、吉、赣”诗坛风气。庐陵刘过（1154—1206）、刘仙伦（生卒年不详）等江湖诗人词人也在孝、光、宁三朝狂放豪纵、声名显赫。宁宗嘉泰、开禧时期，周必大、杨万里、二刘等相继过世，“抚、盱、吉、赣”地区一时没有诗人做盟主，但周、杨提携掖携过的不少诗人还在创作唱和并成立诗社，布衣诗人尤其活跃，曾极作为前期诗人代表对绍定时期江西诗人影响颇大，其他被列入江湖诗派的诗人如利登、黄文雷、邹登龙、赵崇嶠、宋自逊、裘万顷、萧立之、萧澲<sup>④</sup>等人，未被列入江湖诗派的布衣诗人更多，如曾原一、曾原邨、赵崇峰、谌祐、宋自适、宋自道、宋自达以及戴复古所说的黄氏兄弟等人，他们在江西各地创作并互相唱和，丰富了理宗时期的江西诗坛。赣闽盛行的心学、道学学派通过师徒心传以及书院讲授等渠道更加普及和深入人心，让更多的布衣诗人深受心学、道学熏陶，使得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与江浙闽相比，诗风更具江西诗派雅健瘦硬、诚斋体活泼轻快、道学体的质朴理性等综合性地域特色。

六到七年的汀寇、赣寇之乱打击了“抚、盱、吉、赣”等地诗歌的平和繁荣，却意外促进了赣北豫章诗歌活动的一时兴盛。隆兴府不仅成为江西各地诗人的集聚地，也是闽浙游士诗人集聚地。浙闽诗人戴复古、严羽等人主动入场与江西诗人互动交流，在吸收江西诗人审美趣向的同时，也为江西诗坛注入饱含清轻意韵的浙闽诗风，使其与江浙闽诗坛保持同步发展的关系，共同构建了南宋后期东部诗坛。绍定之后的端平更化时期，江湖诗祸以及寇乱影响减弱，江湖诗歌得以重振。

#### 注释：

①《（嘉靖）赣州府志》卷十、《江西通志》卷九四《人物·宁都先贤传》有同样记载。本文撰写受到四川大学孙培博士论文《江湖诗派酬唱研究》启发。孙文云：“钟陵属江南西路隆兴府，隆兴府聚集着宋自逊、赵善扛、黄敏求、裘万顷等四位江湖派诗人，而宋自逊与戴复古、曾原一有唱酬（见《赠戴石屏》《和曾子实题画笺韵》），极有可能也属江湖吟社成员。”

②《宋百家诗存》卷三十一利登《骹稿·小传》。又：盱江即建昌军，县四，南城、南丰、新城、广昌。利登是南城人，《全宋诗》作“金川人”，误。

③祝穆《方輿胜览》卷二十赣州：“崆山，在州南二十里。”《南康记》：“山出空青，因以名之，或呼为崆峒山。多林木果实，州之地脉之母也。”苏轼《过虔馆作》诗云：“水作玉虹流，日丽崆峒晓。”

④南宋的金川属临江军新淦县，即今江西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

⑤刘堦《水云村稿》卷十三《诗说》下注：“看云讳文雷，字希声，淳祐庚戌登科，居建昌城内，仕至浙西提干，舟覆于严州城下，遂溺死。”利登是淳祐元年（1241）进士。

⑥参看《（嘉靖）赣州府志》以及《宋才子传笺证·赵崇蟠传》第587页。刘堦《水云村稿》卷十三《诗说》自注：“白云讳崇蟠字汉宗，居南丰之东门。嘉定壬午（1222）登科，仕至大宗正丞，卒于朝。有子云舍，仕至抚州太守。”

⑦赵诗见《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曾诗见《全宋诗》第38826页。诗歌描述的金精山，为曾原一家乡宁都之地标。

⑧严粲祖籍邵武，但寓居建昌军南城之麻姑山下，其《秋风》“门与姑山对，溪边有故庐”可证。戴复古在江西时，曾于某夏日拜访过严粲，其《访严坦叔》云：“麻姑山下泊，城郭带烟霞。携刺投诗社，移船（一作赍钱）傍酒家。”从“携刺投诗社”看，这是戴复古初次到建昌南城所作，作为外乡人，戴复古拿着名片投谒当地的里中诗社。然《宋才子传笺证·严粲传》（第503页）据戴此诗而言严粲参加过“江湖吟社”，不妥。

⑨袁甫《蒙斋集》卷十一《赠严坦叔（名粲）序》。戴复古淳祐三年（1243）《送吴伯成（汝弑字）归建昌二首》（注：此是包宏斋倅台时作，癸卯夏）其二云：“吾友严华谷，实为君里人。多年入诗社，锦囊贮清新。昨者袁蒙斋，招为入幕宾。”对严粲入袁甫幕府事晚年仍然记忆犹新，而“江湖吟社”与此事相隔不远。

⑩韦居安《梅涧诗话》。《江湖小集》卷十一《华谷集》与《两宋百家诗存》卷三百二十九《华谷集》的首句稍不同。

⑪参见《全宋诗》第38800页。“南丰人，世习儒，明左氏春秋，贯穿百家。晚年用平寇功补官，郑丞相清之力引之，知封州，以廉谨称。”戴复古有《董叔宏、黄伯厚载酒黄塘送别》。

⑫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一。刘堦《水云村稿》卷十三《诗说》自注也云：“苍山讳原一字子实，居宁都金精山前，仕宋，为南昌县丞。”《江西通志》卷九十四云：“（曾原一）及归，偕其叔父益之倾资产筑城以御寇。隐苍山，构万松亭。有

诗号《苍山集》，人多宗之。”

⑬详参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二《宋文林郎墓志铭》。括号中的字、号，根据多种文献考据而得。又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十一《题宋自达诗》：“金华宋氏父子六人，侨居豫昌，余少皆识之。谦甫尤知名，八龙之绝小，五虎之最怒者。及来江东，又识德甫，则其弟也。”

⑭曹彦约《昌谷集》卷十七，结尾云：“嘉定壬午（十五年，1222）冬十月癸未，东汇泽曹某书于湖庄所性堂。”可知嘉定时期的宋自逊专注于道学和诗歌，壶山诗集已经结集。

⑮刘克庄对宋自逊诗歌称颂有加，《后村集》卷十六《题宋谦父诗卷》云：“佳山祠畔结茅茨，犹记吹埙更和篴。苏氏旧称小坡赋，秦家晚重少章诗。交游一老今华发，畴昔诸昆尽白眉。子不可来吾欲去，壁间尘榻拂何时。”

⑯据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十四《祭赵保昌叔愚文》（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挥麈人，如捉月仙）以及卷十《送赵叔愚赴浔州理掾》，赵叔愚名保昌。《江湖小集》卷八十五乐雷发《雪矶丛稿》有《戊戌（1178）冬，仆客桂林，雪中赵叔愚司理书张司业逢贾岛绝句为寄，今冬对雪，感而有作》、卷八十八乐雷发《雪矶丛稿》有《呈赵叔愚司理》。

⑰《宋才子传笺证·严羽传》第493页云其为避乱作，似无据。又根据《庚辰纪乱》云其绍定三年末回到邵武，似也不尽然，因为当时“汀寇”之乱尚未全平。

⑱戴复古《寄镇江王子文总卿》：“一代文章手，官如水样清。”与王子文即王埜关系密切长久。

⑲严羽《遇周子陵自行在还，言石屏消息》：“不见石屏老，相思问客舡。长沙闻近别，行在定虚传。兵革来书断，江湖望眼穿。他时同话此，把臂喜应颠。”所云周子陵可能与周子俊是同一个人或兄弟。

⑳黄行之可能与黄存之为兄弟。后文戴复古所云的黄子鲁、裘万顷所云的黄子益可能为黄氏兄弟的长辈。

㉑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六。宋自逊亦有《东湖看荷花呈愿父》（《全宋诗》第38833页），均作：“团团堤路行无极，一株一步杨柳碧。佳人反覆看荷花，自恨鬓边簪不得。”愿父或原父，是宋自道的字，从诗意看，此诗当是戴复古所作。

㉒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五《裘司直见访留款》诗后自注云：“仆时寓隆兴东湖，裘居西山下。”裘万顷也是豫章本地诗人，与戴复古唱和。

㉓戴复古嘉熙元年（1237）正月一日，在赣州遇到张端义，有《张端义应诏上书，谪曲江，正月一日赣州相遇》诗。

㉔二萧是赣州宁都人，与曾氏兄弟有唱和。此外还有李泳、李涛、李白中、吴汝弼、余观复、罗椅、罗与之、黄大受、黄敏求、萧元之、章采、章粲等江西诗人被列入江湖诗派。

####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宋诗选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元）虞集. 道园学古录 [M]. 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35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9.

- 
- [3] (元) 吴澄. 吴文正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9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 江西通志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513-518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5] 张宏生. 江湖诗派研究 [M]. 北京: 中国书局, 1995.
- [6] (宋) 袁甫. 蒙斋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7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7] (宋) 袁燮. 絜斋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5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8] 傅璇琮. 全宋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9] (宋) 真德秀. 西山文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7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宋) 程颢, 程颐. 二程文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34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元) 方回. 瀛奎律髓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36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2] (宋) 陈起. 江湖小集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35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傅璇琮. 宋才子传笺证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 [14] (宋) 周密. 齐东野语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86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5] 伍晓蔓. 江西宗派研究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5.